

重走丝绸之路

“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李庆新 著

海上丝绸之路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黄山书社

海上丝绸之路

李庆新 著

黄山书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海上丝绸之路/李庆新著. —合肥: 黄山书社, 2016.1
ISBN 978-7-5461-5440-4

I. ①海… II. ①李… III. ①海上运输-丝绸之路-
历史-中国 IV. ①K2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006813 号

海上丝绸之路

李庆新 著

HAISHANG SICHOU ZHI LU

出品人 任耕耘
总策划 任耕耘
策划 马磊 高杨
责任编辑 张月阳 高杨
装帧设计 未氓
出版发行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http://www.press-mart.com>)
黄山书社(<http://www.hspress.cn>)
地址邮编 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翡翠路 1118 号出版传媒广场 7 层 230071
印刷 合肥精艺印刷有限公司
版次 2016 年 1 月第 1 版
印次 201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710mm × 1000mm 1/16
字数 220 千
印张 20
书号 ISBN 978-7-5461-5440-4
定价 48.00 元

服务热线 0551-63533706

销售热线 0551-63533761

官方直营书店(<http://hssbook.taobao.com>)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凡本社图书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制科联系。

联系电话 0551-63533725

“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前 言

20 世纪英国伟大的思想家罗素指出：“不同文明的接触，已经常常成为人类进步的里程碑。希腊学习埃及，罗马学习希腊，阿拉伯学习罗马，中世纪的欧洲学习阿拉伯，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学习东罗马帝国，学生胜于老师的先例有不少。”^[1]文明的接触与交流通常凭借一定的交通渠道，而海上丝绸之路是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渠道。

古代连接东西方交通的道路有陆海两途。陆路通道东端起自中国渭水流域，向西沿河西走廊，进入中亚、南亚、西亚，远至北非、欧洲，早在公元前 2 世纪已经形成。在此后两千余年里，大量的中国丝、丝织品和其他商品，皆经此路运销西方，故称为丝绸之路。此外，从蒙古草原出发，穿越西伯利亚进入东欧、俄罗斯，此路被称为草原丝绸之路。或从中国西南地区出发，翻越青藏高原，进入南亚次大陆，此路则被称为西南丝绸之路。

海路通道东端自中国沿海港口，从东南沿海港口起航，往南穿越南海，经马六甲海峡进入印度洋、波斯湾地区，远及东非、欧洲。从北方沿海通过东海，则可前往日本、朝鲜。此海路被称为海上丝绸之路。

丝绸之路一词，最早由 19 世纪 70 年代德国地理学家、地质

学家李希霍芬（Richtshofen, Ferdinand von）在《中国》（第1卷）中提出，他在谈到中国经西域到希腊、罗马的陆上交通路线时，鉴于大量的中国丝和丝织品经此路运销西方，遂称之为丝绸之路。1987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启动“丝绸之路：对话之路综合考察”项目。1990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又推进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综合考察。此后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的名称广为人知，并被广泛使用。

在公元前后几个世纪里，埃及、希腊、罗马、波斯、印度、中国等文明古国，不断致力于发展海上交通，为打通沟通东西方的海上丝绸之路做出了各自的重要贡献，中国成为海上丝绸之路东方的发祥地。此后两千余年，从中国沿海港口起航的海上丝绸之路，贯通东北亚、东南亚、印度洋以及波斯湾、地中海沿海地区，其中经东海通往东北亚地区的海上通道被称为东海丝绸之路，通往南海—印度洋方向的海上通道被称为南海丝绸之路。

南海丝绸之路是东西方海上交通的主要航线，发展历程大体可划分为如下几个阶段：

秦汉时期海外交通初兴，并与西方海上航线相对接。秦汉之际，秦朝将领赵佗在岭南建立具有海洋性格的南越国，势力东到闽越，西抵黔滇，南至今越南北部，与中国北方的匈奴并称“强胡劲越”，拥有发达的造船业和强大的海军，主导着南海交通与贸易。

番禺作为南越国的国都和岭南中心城市，是南海贸易的主要港口。1982年，南越“文帝陵”出土的具有波斯风格的银盒、两河流域工艺制作的金珠泡饰、非洲原支象牙等珍贵文物，见证了

当时番禺的海外贸易实况。南越国时期的对外贸易，不仅奠定了番禺作为南海贸易中心与交通枢纽的地位，而且为汉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公元前 111 年，汉朝平南越，汉武帝派遣使者从徐闻、合浦等地前往南海地区，最远到达印度南部的黄支国和已程不国（今斯里兰卡），这是海上丝绸之路发展史上的里程碑。从岭南番禺、徐闻、合浦等港口起航西行，与从地中海、波斯湾、印度洋沿海港口出发往东航行的海上航线，在南印度洋海面实现了对接，标志着连接东西方的海上丝绸之路已经贯通。

魏晋南北朝时期开拓南海新航路。这一时期是中国的分裂割据时期，南方六朝政权（东吴、东晋、宋、齐、梁、陈）因为与北方对峙，更注重向南方发展，经略海洋。南方较为安定的环境与不断加快的开发进程，造船、航海技术的进步以及航海经验的积累，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南海丝绸之路开辟了自广州起航，经海南岛东面海域，穿越西沙群岛海面的深海航线，这条航线往南穿越马六甲海峡、印度洋后，向西延伸到了波斯湾地区。

隋唐时期海路大通，日趋繁荣。隋唐时期中国是世界上最富强的国家之一。中国经济重心南移，社会经济取得了高度的发展，并创造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和空前强大的国力。唐朝与西方的交往从以陆路为主转向以海路为主，海上丝绸之路进入大发展时期。唐朝宰相贾耽撰《皇华四达记》记录了广州通海夷道，它贯穿南海、印度洋、波斯湾和东非海岸的 90 多个国家和地区，是中古世界最长的远洋航线和亚、非洲际海上大动脉。中国交州（今

属越南)、广州、泉州、明州(宁波)、扬州、登州等成为海上丝绸之路上的重要港口。唐朝在广州设立市舶使,创建了一系列贸易管理制度,宋代以后在其他港口设置市舶司,一直到清代,始为海关制度所取代。

这一时期南海丝绸之路与中国东南沿海交通紧密对接,并与航向日本、朝鲜半岛的东海丝绸之路相连接,活跃在东北亚海域的新罗商人的贸易活动对密切东亚地区的经贸与文化联系发挥了积极作用。

宋元时期海上航线西延南拓,臻于鼎盛。宋元时期中国造船技术和航海技术明显提高,指南针应用于航海,中国商船的远航能力大为加强。更重要的是宋代社会经济发展超越前代,海上贸易在政府鼓励下得到极大发展。元朝在经济上采用重商政策,鼓励海外贸易,海上丝绸之路发展进入鼎盛阶段。

宋代南海丝绸之路的航线在前代基础上进一步向西延伸,最远抵达今西班牙南部。东洋航线出现了一条新航路:从福建泉州起航,经澎湖、琉球(台湾)至菲律宾海域;或从泉州或广州出发,经过广东沿海、南海诸岛航向爪哇(Java)岛北部海域。

宋代先后在广州、明州、杭州、泉州、温州、秀州和密州等沿海港口设置市舶司,管理海外贸易。神宗时颁布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海洋贸易管理条例——《广州市舶条法》,元代时对海外贸易的法规进行修订,先后颁行了《至元市舶法》《延祐市舶法》。

明清时期南海交通纳入世界海洋贸易体系。15—18世纪是人类历史发生重大变革的时代,地理大发现与大航海时代开辟了世界海洋贸易新时代。欧洲商人的殖民活动与海洋扩张,改变了传

统海上丝绸之路以和平贸易为基调的特性。明帝国长期采取海禁政策，压制了唐宋以来蓬勃发展的海洋贸易，长期关闭除广东之外的福建、浙江市舶司。清朝统一台湾后，虽然在东南沿海设置了粤、闽、浙、江四海关，但由于历史、地理、政治等因素，中国与西方国家的贸易逐渐集中到广东。1757年，清廷将对西方贸易限于广州，即所谓的“一口通商”，一直到鸦片战争后出现五口通商为止。

经过西方人的航海扩张，传统的海上丝绸之路纳入了早期全球化时代的海洋贸易体系。从西欧出发前往中国的海洋航线出现两条新航路：一是从欧洲港口起航，沿非洲西海岸南下，绕过非洲南端好望角，横渡印度洋，经苏门答腊岛西南部海面穿越巽他海峡，北上进入南海，到达中国澳门、广州、月港等港口；或者绕道马六甲海峡，从中南半岛海面到达中国港口。另一条是从欧洲港口起航横渡大西洋，经美洲新大陆绕过麦哲伦海峡，横渡太平洋，航行至菲律宾群岛，再从菲律宾直航到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后来美国加入对华贸易，又开辟了新的太平洋航线。

在人类文明进程中，海上丝绸之路把东西方各国各民族联结在一起，促进不同国家、不同种族之间的经济交往与文化交流，推动世界历史不断向前发展，为人类社会进步做出重要的贡献。

海上丝绸之路是东西方海上交通、海洋贸易的通道

1900多年前，罗马帝国学者老普林尼（Gaius Plinius Secundus）在《自然史》中说过这么一句话：“在世界不同地方保

持这种不间断的贸易往来，正如人的身体吸收营养一样，是十分有益的！”^[2]公元前后，东西方各国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进行经贸交往，丰富彼此间的经济生活，分享人类创造的物质文明。中国对外贸易输出的商品，主要有丝绸和黄金。进口的商品，主要有香料、珠玑、翠羽、犀角、象牙、玳瑁、琉璃、玻璃、玛瑙及各种宝石等奢侈品。当时中国南方大港番禺，出现“珠玑、犀、玳瑁、果、布之凑”的活跃景象，成为中国南方为数不多的商业都会和南海交通的枢纽，并且在海上丝绸之路两千多年的历史中一直长盛不衰。

8—9世纪，东西方架起了经贸联系的海路与陆路桥梁，南海—印度洋—波斯湾地区长期畅通的海上贸易往来以及文化、技术与人口交流，堪称世界海洋文明史上第一个“大航海时代”，东亚与南亚、西亚乃至欧洲形成深度的贸易联系与市场互动，对当时以及往后很长一段时期的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发展产生深远影响。东南亚海域发现的黑石号沉船和印坦沉船，出水大批来自中国内陆的湖南、河北、河南、淮南和沿海的浙东、岭南地区的精美瓷器，说明瓷器成为海上丝路上的大宗长途贩运商品。产品出口与市场需求带动了手工业生产，出现专门为海外市场生产的外向型经济产业。由唐及宋，中国出现了为国际学界所称道的“中世纪经济革命”和“中古社会变迁”。

拜国际海洋贸易与市场力量所赐，东西方出现一批繁荣的港口城市。9世纪中叶的阿拉伯文献指出：“当时从伊拉克去中国和印度的商人络绎不绝。”^[3]波斯湾—地中海沿海地区的港口，例如苏哈尔、马斯喀特、巴士拉、尸罗夫、开罗、亚历山大港等，都

是著名的国际港口。阿拉伯商人是古代世界海洋贸易的主力，周流天下，贩卖织造品、宝石、铜镜、料珠、香料、椰枣、蔗糖、棉织品、毛织品、钢铁工具和玻璃器皿；他们输入的货物，有来自远东的香料、樟脑、丝绸和来自非洲的象牙、黑檀和黑奴。帝国首都巴格达通过底格里斯河通向巴士拉，进入波斯湾，它不仅是阿拉伯帝国的核心，而且是来自印度、马来群岛、中国、突厥、斯堪的纳维亚、俄罗斯和东非商货的集散中心，被誉为“举世无匹的城市”。

中国沿海港口城市呈现普遍的繁荣，各种各样的海外珍异充斥着港口市场。阿拉伯古典地理学名著《道里邦国志》记录了唐朝南部沿海的四个主要港口，首先是鲁金（Lūqīn，龙编，今越南河内），其次是唐朝最大的港口汉府（Khānfū，广府，今广州），还有汉久（Khānjū，今福州；一说杭州）、刚突（Qāntū，江都，今扬州）。^[4]唐人这样描述当时的南方大港广州：“南海有国之重镇，北方之东西，中土之士庶，觐连毂击，合会于其间者，日千百焉。”^[5]“外国之货日至……珠香、犀象、玳瑁，希世之珍，溢于中国，不可胜用。”^[6]长江下游的杭州，“走闽、禺、瓯、越之宾货”^[7]。大诗人元稹《和乐天送客游岭南二十韵》诗中云：“俗重语儿巾，舶主腰藏宝。”“语儿巾”下注：“南方去京华绝远，冠冕不至，唯海路稍通，吴中商肆多榜云‘此有语儿巾’。”^[8]就连地处内陆的京师长安，因为商路畅通，“宝货药肆，咸丰衍于南方之物”^[9]。

随着地理大发现与大航海时代的来临，几乎所有涉海国家都直接或间接地纳入世界海洋贸易体系，不同程度地参与早期全球

化进程。中国茶叶出口异军突起，与丝绸、瓷器成为主要出口商品之一。中国进口商品除了传统的南海诸国土特产外，后来还增加了西洋毛织品、棉织品、钟表、香水、皮毛、金属等，来自日本、美洲的白银也大量流入中国。

海上丝绸之路是东西方和平交往、增进友谊的纽带

贯通东西方的海上丝绸之路，把世界文明古国如埃及、希腊、罗马、波斯、印度、中国以及美洲都联结在一起，为人类文明进步与社会发展做出杰出贡献。沿线各国使节、商人、僧侣、旅行家，沿着这条海上航路，往返于东西方涉海国家与地区。条条大路通罗马，世界因海路大通而拉近距离，增多渠道，官方接触因之更加频繁，民间社会联系因之更加密切。从地中海海域的西班牙南部，经过地中海、非洲东部，穿过印度洋各国，到南海诸国，直至中国东南沿海各地，海上丝绸之路是沟通东西方的交通要道和主要桥梁。

8—14 世纪，中国是世界上最富强的帝国之一。唐朝与海外发生官方关系的国家和地区有 70 余个。与宋元帝国有交往的国家、地区有 140 多个。经过明初郑和下西洋的推动，中国与周边国家形成以“朝贡”关系为核心的盛况空前的“东亚秩序”。这一秩序建基于中国与周边国家所构成的具有相同伦理道德与价值理念的“同文之国”，中国崇尚王道，以“怀柔远人”、以德服人、和平相处为原则，经济上以“厚往薄来”的官方贸易为方式，融合了国际邦交和经贸关系，使中国与相关国家都从这种制度安排

中获得各自的利益诉求，深受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各国的认同、拥护与支持。15世纪以后，古代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纳入世界海洋贸易网络之中，中国对外关系与贸易对象由东南亚转到欧美国家，东西方国际关系展开全新的一页。

海上丝绸之路是东西方文化交流、宗教传播之路

海上丝绸之路是沟通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桥梁，沿线各国族群海洋文化的各自发展与相互交流、互相融摄，形成深厚而多元的海上丝绸之路文化。公元前后海上丝绸之路的开通与拓展，不仅标志着中国南海与印度洋、地中海海上商贸网络的日趋成熟，而且意味着中华文化与印度文化、罗马文化在海洋空间的接触交汇与互相沟通。伴随着中国、东南亚商船携带丝绸从珠江口—北部湾沿海的番禺、徐闻、合浦、日南等港口出发，航向印度洋，中国文化开始涉足东南亚与南亚次大陆；而印度文化、罗马文化与佛教、婆罗门教等宗教，也随着印度、东南亚商船传入东南亚，并经由中南半岛海域、华南港口传进中国。广州的南越国“文帝陵”、番禺汉墓遗址的考古发现，光孝寺、华林寺等佛教寺院；北部湾沿海合浦汉墓、徐闻南朝窖藏等考古发掘；越南红河平原的“羸娄佛教”遗存，中部美山（My Son）、同阳（Dong Duong）和茶乔（Tra Kieu）遗址，南部印度化时代的俄厄（Oc Eo）港口遗址；马来西亚柔佛马坎门索尔顿遗址；印度阿里卡美都（Arikamedu）遗址、康契普腊姆（Conjevaram）遗址等重大考古发现的海上丝路遗址遗物、宗教建筑遗存，都见证了早期海上

丝绸之路宗教文化交流结出的丰硕“初果”。

公元1世纪，波斯湾北岸的阿曼那出现一种用棕榈纤维捆扎的马达拉塔（madarata）船，这种造船技术后来在尸罗夫和阿曼进一步发展成用椰索绳缝合、用油灰填塞船缝的新式缝合木船。中世纪早期，阿曼和阿拉伯南部沿海的船工还创造出用椰索缝合的单桅木船，叫作“马卡布”（markab）和“赛发纳”（safinah）。直到9世纪，尸罗夫船仍然用绳索而不是用钉子拼合。由于阿拉伯商船经常来往于中国南方港口，3—4世纪时这种造船技术也传入岭南，为善于造舟航海的广东人所掌握。嵇含《南方草木状》记载说，胡人以桃榔皮作绳子，“联木为舟”，因为桃榔皮浸水后更为柔韧。9世纪，这种技术继续在岭南沿海流传。到了12世纪，上述造船技术又有改进，出现不用铁钉桐油而用藤捆绑船板的“藤舟”，船缝以海上所生干茜草填塞，这种草遇水则涨，“舟为之不漏”，“其舟甚大，越大海，商贩皆用之”^[10]。

唐朝在中外交往中充分感受到域外文化的传入所带来的异乎寻常的精神享受，海外世界给唐人带来琳琅满目、千奇百怪的异域珍宝，同时给中华文化注入鲜活的血液。印度佛教、观星术（天文学）和蔗糖技术，西亚伊斯兰教、景教、摩尼教，胡舞和胡乐，美术和戏曲，拜占庭医学，纷至沓来，成为建构大唐文化的重要外来资源。所以日本学者木宫泰彦说：“唐朝的文化，并不单是汉人的文化，而且夹杂着来自四面八方的外国文化，尤其是夹杂着印度系统和伊朗系统的文化，这是很显著的事实。”^[11]

8世纪以后，从海路引进到中国的外国物种多种多样，有被称为“海药”的外国药物，还有粮食作物，不仅增加了中国的药

物资源和食物资源，也丰富了中医中药和中国人的传统食谱。16世纪中叶以后，番薯、木瓜等作物被引入广东、福建并迅速传至内地，对中国饮食文化产生重要影响。特别是番薯的引种推广，使之成为小麦、水稻之外的主要粮食作物，极大地改变了中国人的粮食结构，缓解了由于人口增长造成的粮食短缺。

先知穆罕默德说过：“学问，即使远在中国，亦当求得之。”^[12]这条训教世代激励着穆斯林前往东方寻求学问。8—14世纪，许多中国器物为阿拉伯人所喜好并使用，其制作技艺亦随之西传。瓷器是唐宋以后中国主要出口商品之一，承载着唐帝国高度发达文明的精美绝伦的花瓷和乳白瓷输入阿拉伯地区，在西亚掀起持久的陶瓷热。阿拉伯商人苏莱曼所著《中国印度见闻录》记载，广州有大批即将运往印度洋各国的瓷器，这些质地细薄又富有釉彩的中国瓷器令人赏心悦目，大受赞赏，苏莱曼还描述了瓷器的制造技术。阿拉伯人在传统制瓷技术基础上吸收中国瓷的颜色、瓷胎和形状的长处，制造出新的伊斯兰瓷器。15世纪以后，中国瓷器通过葡萄牙人、西班牙人、荷兰人的商船大量运往欧洲，青花瓷再次激活了近东的陶瓷艺术，并直接刺激欧洲制瓷技术的发展。所以，西方学者将欧洲制瓷业出现的新成就归功于伊斯兰和中国。

东西方文化交流是双向互动，互相借鉴，彼此为用的，既有由西向东的传播，也有由东向西的涸流。宋人朱彧在《萍洲可谈》中记载了11—12世纪广州的中国海船使用指南针的情形，这是迄今所见指南针应用于航海的最早记录。此后，中国海商和船员在与阿拉伯、波斯人贸易的过程中，将这一技术带到海外，并与阿拉伯人的航海技术相结合，推动了世界航海事业的发展，也为

后来欧洲人的地理大发现和新航线的开辟奠定了技术基础和知识储备。

新航路开辟后，伴随西方商人东来的还有天主教传教士。耶稣会士给东方带来了欧洲的地理学、数学、几何学等科学，印刷、火器制造等技术，以及绘画、音乐等艺术，与中国传统文化互相融合，成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16世纪中叶以后，长期对欧美国家通商的广州、澳门口岸聚集了一波又一波的西方商人、船员、传教士、旅行家、艺术家、科学家，他们把中国经典古籍翻译介绍到西方，解说中国传统文化，推动西方汉学（中国学）研究的发展。带有浓郁东方情调的工艺美术品、服装、瓷器、扇子、绣品、银器、家具等被带到欧洲和新大陆，在建筑、园艺、制瓷、绘画、家具等行业受到追捧效仿，掀起兴盛一时的“中国时尚”。

海上丝绸之路是东西方文明交流、和平交往的产物，是一种兼具本土性与国际性、主体性与多元性、不断融合东西方文化的世界性海洋文明结晶，它深深地含蕴在沿线各国诸族群的海洋性生活之中，并在塑造国家之间、族群之间的经济交往、政治关系、社会结构、文化交流、道德信仰等方面都发挥过历史性的多方面价值与贡献，深刻地影响着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历史进程。

20世纪80年代，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推动了“丝绸之路：对话之路综合考察”十年计划，就是弘扬丝绸之路所蕴涵的“对话”“交流”“和平”“友谊”等人文精髓，促进世界和平发展。当前，中国正致力于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海上丝绸之路在新的历史时期被注入全新的发展理念

和丰富内容，必将引领中国和沿线各国创造出海洋文明新成果。

注 释

1. [英] 罗素. 中国问题. 秦悦, 译. 上海: 学林出版社, 1996:146.
2. [法] 让-诺埃尔·罗伯特. 从罗马到中国——恺撒大帝时代的丝绸之路.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198.
3. 中国印度见闻录. 穆根来等, 译. 北京: 中华书局, 1983:95.
4. [阿拉伯] 伊本·胡尔达兹比赫. 道里邦国志. 宋岷, 译注. 北京: 中华书局, 1991:71~72.
5. (清) 董诰等编. 全唐文 (卷四百二十七) 于邵. 送刘协律序.
6. (唐) 韩愈. 昌黎先生集 (卷四) 送郑权尚书南海.
7. (清) 董诰等编. 全唐文 (卷七百三十六) 沈亚之. 杭州场壁记.
8. (唐) 元稹. 元氏长庆集 (卷十二) 和乐天送客游岭南二十韵.
9. (唐) 高彦休. 唐阙史 (卷下) 丞相兰陵公晚遇.
10. (宋) 周去非. 岭外代答 (卷六) 器用门. 杨武泉, 校注. 北京: 中华书局, 1999:218.
11. [日] 木宫泰彦. 日中文化交流史. 胡锡年,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0:214~215.
12. 张广达. 海舶来天方, 丝路通大食——中国与阿拉伯世界的历史联系的回顾 // 西域史地丛稿初编.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5:438.